

宗 乡 总 会 丛 书 之 一

新加坡华人

从开埠到建国

崔贵强 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宗乡总会丛书

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PAST
AND PRESENT

崔贵强 著

K339.8
C970.1

TSBN
P202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1994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37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0106

EPB Publishers Pte Ltd

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162 Bukit Merah Central #04-3545

Singapore 0315

联合出版

初版 1994年

版权所有 · 不准翻印

作 者 崔贵强

封面题字 杨伟群

执行编辑 许垂扬

封面设计 陈志贤

ISBN 9971 0401 1

14级 明 (J)

Printed by FSP Printers Pte Ltd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代序)

自开埠100多年来，新加坡历经风雨与沧桑，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岛国，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稳定繁荣。这不得不归功于政府（尤其是独立后的政府）之高瞻远瞩，极力经营。而岛上各民族之同心协力，艰苦奋斗，也功不可没。华人居各族人数之冠，构成了人口最重要的一环。在新加坡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上，我们的先辈充分发挥了披荆斩棘，克勤克俭，勇猛拼搏与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胼手胝足，流血流汗，逢山开路，遇河搭桥，他们以血汗来灌溉新加坡的土地，使新加坡从一个荒岛衍化为现代化的城市。这段历史，何等慷慨壮烈；这种精神，何等激越昂扬。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本完整的史籍，来载述我们先辈的劳绩，从而学习他们的伟大精神。

为什么迫切需要呢？因为直至今天，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有系统而令人满意的新加坡华人历史的书籍。虽然早在1923年，名律师宋旺相 (Song Ong Siang) 曾用英文撰写了一部《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该书卷帙浩繁，文字凝练畅达。其资料主要取材于《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 与《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以及时人提供的口述材料。作者采用编年体的写法，以每10年为一章，写出每10年间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活动，内容翔实有趣。但其缺点是像载述流水帐，缺乏系统化，予人以一种琐碎割裂的感觉。更可惜的是，宋氏不懂中文，而且也只写到1919年。

其次，巴素博士 (Dr. V. Purcell) 也写了一部《马来亚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首版于1948年刊行，1967年重印。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华人移殖海峡殖民地 (The Straits Settlements，包括马六甲、槟榔屿与新加坡) 的早期历史；第二部分论析20世纪首40年间华人的社会、政治与教育等课题；第三部分记载了日治时期与战后初年华人的处境。巴素的著作中有关新加坡华人的部分着墨不多，也只写到1946年。而且与宋氏的《百年史》一样，巴素的著述也没有应用华文资料，写来不全面，无法令人满意。

1991年，广州暨南大学的两位年轻学者林远辉与张应龙合著了一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这部书颇有分量，作者也写得用心。可是囿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他们无法应用若干重要的第一与第二手资料，而且章节的结构颇为凌乱，亦难以掌握重点，这虽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亦有一些缺陷尚待弥补。

实际上，百多年来的新加坡华人历史，内容错综复杂，纷呈杂沓，要把它来龙去脉理出一个头绪来，使人一目了然，颇不容易。至于有关史料，更是浩如烟海。殖民地档案，卷帙浩繁，杂乱无章，但它们可是治华人史必须翻阅与采撷的资料。此外，历年的华文报章，积年累月，也汗牛充栋，它们也是治华人史的资料宝库。单单上述两项资料，凭个人的时间与精力，即使终日皓首穷经，也无法窥其全豹。何况我平日忙于教课，只能忙里偷闲，抽空翻阅。因此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对此不觉深感愧疚。

幸而近些年来，由于学者的努力发掘与探讨，涌现了不少新史料以及研究成果。一项很令人兴奋的成就是碑铭金石文字的发掘，弥补了若干文献之不足，使我们能了解过去一些不易解释的问题。此外，国内外诸多学者，努力从事许多华人史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有助于我撰写这部华人通史，谨此向他们致敬。

这部华人通史，是我继《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89年)与《新加坡华人报刊与报人》(1993年)的另一本著作，从酝酿到完成撰述，前后历时约3年。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在国立大学执教，这里的资料齐备，我因利乘便，得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再过三两年，我便要退休了，在退休之前，我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这只是一项工作的完成，作了一个交代，我不敢妄称这是个了不起的贡献。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太广泛了，我个人能力有限，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而且限于篇幅，有些课题只能以蜻蜓点水式来处理，相信无法使人满意。

新加坡华人历史的许多课题，尚待专家、学者们去研究。一座古庙、一条老街、一种行业、一个社团、一群卑微的小人物，都可作深入的专题研究。我很高兴看到已经有人做了，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我祈望今后有更多人作更多专题研究。只有这样，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才能更完整与充实，更能散发出万丈光芒。

我必须感谢国立大学前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陈重瑜博士，她知道我有意从事学术研究，减轻了我的教学负荷，使我有更充裕的时间早日完成这部著述。澳洲学者杨进发博士对本书提出了若干宝贵的意见，使它更臻完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台湾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慷慨赞助本书的出版，并列为宗乡总会丛书，使它能与读者见面。复蒙名书法家杨伟群先生封面题字，生色不少。对上述诸团体与个人，作者谨致以万二分谢意。最后我祈望读者能给我提供意见。

崔贵强

1993年12月

目录

第一章：1819年以前的华人	1
第二章：移民南来与人口增长（1819-1941年）	9
第一节：19世纪移民与人口激增	9
第二节：20世纪移民与人口激增	14
第三节：女性移民	21
第四节：移民是怎样南来的？	23
第三章：社会发展（1819-1941年）	35
第一节：华人社区的成长	35
第二节：华人社会阶层	45
第三节：社团的成立、发展与功能	57
第四节：生活习俗	81
第五节：海峡华人社会	98
第六节：私会党与娼妓业	112
第四章：经济活动（1819-1941年）	125
第一节：资金的累积	125
第二节：商业活动	126
第三节：种植业	130
第四节：工业	131
第五节：银行业	135
第六节：华人劳工	141
第七节：方言群体与行业分布	146
第五章：战前的华文教育	150
第一节：19世纪的华文教育	150
第二节：20世纪前期的华文教育	156
第六章：华人与中国（一）	169
第一节：晚清驻新加坡领事馆	169
第二节：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斗争	182

第七章：华人与中国（二）	187
第一节：国民党人在新加坡	187
第二节：华人反日运动	189
第三节：新加坡华人汇款到中国	201
第四节：新加坡华人在中国的投资	205
第八章：日治时期的华人（1942-1945年）	212
第一节：新加坡的沦陷	212
第二节：大检证的悲剧	213
第三节：5千万元奉纳金的勒索	215
第四节：华侨协会的组织	217
第五节：粮荒与增产	218
第六节：抗日活动的展开	220
第七节：教育与出版	221
第九章：战后40多年来的人口增长	225
第一节：人口增长的趋势	225
第二节：家庭计划的推行	228
第三节：人口政策的修订	233
第十章：战后华人社会的变异	237
第一节：社会阶层的变异	238
第二节：社团的演变	241
第三节：家庭与价值观的改变	246
第十一章：战后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	251
第一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251
第二节：华人的经济活动	254
第十二章：战后40多年来的华文教育	266
第一节：华校与华校生的增减	266
第二节：新教育政策	269
第三节：改编华校教科书	275
第四节：新加坡南洋大学	276

第十三章：战后的海峡华人	282
第一节：海峡华人与新宪制	282
第二节：海峡华人与1948年立法议会选举	283
第三节：从保守到醒悟	284
第四节：政坛红人与新加坡发展	287
第十四章：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	293
第一节：战后初期的国家认同	293
第二节：50年代国家认同的转向	295
第三节：独立后认同感的升华	297
第四节：国家意识与文化的建立	301
第十五章：总结	306
参考书目	309

第一章：1819年以前的华人

概述

早在7世纪与13世纪之间，新加坡隶属于苏门答腊东岸三佛齐王国的版图，那时候叫做“凌牙门”，是一个商舶辐辏的海港。

14世纪之际，新加坡已摆脱了三佛齐的羁绊，成为一独立王国，中心在今日的福康宁山 (Fort Canning Hill)，中国人把它称为“淡马锡”，属下的“龙牙门”（今天的发巴Keppel海港）水道，为东西商舶必经之路。那时候，这里附近已经有中国人居住了，他们大概是从泉州来的商人。此外，新加坡也有宋代铜钱及元明陶瓷碎片的出土，这些遗物也可能是当时的中国商人带来的。

在1819年莱佛士 (Stamford Raffles) 登陆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华人了。他们在实利己山 (Bukit Selegie) 与史坦福山 (Mt. Stamford) 等地开辟了甘蜜种植园，这些华人先驱可能是来自廖内群岛的闽、潮籍人士。

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标志着近代新加坡的肇端，掀开了新加坡历史崭新的一页。然而，1819年以前新加坡的历史面貌是怎样的？那时期的新加坡华人又是怎样的呢？要了解早期的新加坡及其华人，只有从古籍（尤其是中国古籍）与考古发掘去探寻蛛丝马迹。

介于7世纪与13世纪之间，一个名叫室利佛逝（三佛齐）的古国雄踞一方，它以今日苏岛南部的巨港 (Palembang) 为中心，版图奄有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扼制了东西水路交通的咽喉，版图辽阔，势力雄厚，并发展为一个佛教中心。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新加坡是三佛齐的属国。根据《诸蕃志》（成书于1225年）的载述，那时新加坡叫做“凌牙门”，¹是个商舶辐辏的商港。

到了14世纪初，三佛齐已式微，新加坡终于摆脱了三佛齐的羁绊，崛起成为一独立王国。它的疆域东濒海滨，南抵新加坡河及其沼泽地带，其核心在福康宁山，山上矗立着皇宫、城堡与神庙。那时候，新加坡是个繁荣的商港。这个早期的新加坡王国，立国近百年，传了五世。这期间，北方的暹国虎视眈眈，挥军南侵；南方的爪哇也野心勃勃，觊觎频频。1391年，爪哇满者伯夷 (Majapahit) 王国大举进攻新加坡，铁蹄所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爪哇军在凯旋之余，立碑于新加坡河口，以志胜利。新加坡国王伊斯干陀沙 (Iskandar Shah) 逃往麻坡，不久迁往马六甲，建立了马六甲王国，新加坡王国至此宣告沦亡。

中国载籍把新加坡王国称为“单马锡”，该名最早著录于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成书于1349年）。² 后来的典籍也有作“淡马锡”及“淡马锡门”的，这些都是Temasek的对音，学者几乎都考订为今日的新加坡。《马来纪年》一书也载述了苏门答腊的王子如何从廖内坐船航抵淡马锡，登岸后不久看到了一头狮子，视为吉祥之物，因而建立了淡马锡城，命名为“狮城” (Singapura)。那时候，皇家山上守卫森严，闲杂人等一概不许进入，故名“禁山” (Bukit Larangan)。

《岛夷志略》告诉我们：新加坡王国“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这里有一条重要的水道，叫做“龙牙门”，就是今天的岌巴港 (Keppel Harbour)，介于新加坡南岸与圣淘沙 (Sentosa，以前称绝后岛 Blakang Mati) 之间。³ “龙牙门”是东西商舶必经的水路，贸易繁盛。贸易商品有“赤金、青缎、花布、处磁器、铁鼎之类”。可是新加坡“山无美材，贡无异货”，它与泉州建立了贸易关系。这里的海人 (Orang Laut) “俗好劫掠”，他们经常成群结队，窝藏在水道深处，“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但“回船之际，至吉利门 (Kerimon)”，则贼船二三百只必群起而攻商舶，杀人越货。

《岛夷志略》又说：“（单马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这说明了14世纪的岌巴港，已经有中国人居住了，这也是华人寄居新加坡和马来半岛最早的纪录。可惜汪大渊语焉不详，留下一些不能肯定回答的问题。这些中国人是何方人氏？他们是过客？还是定居？他们的服饰如何？生活怎样？因为汪大渊接着说，这里和泉州有贸易关系，所以这些中国人可能是来经商的过客。他们随着季候风来往穿梭于中国与南方的海域，从事贸易活动。

由上述可见，14世纪新加坡的居民，有聚居在皇家山及其附近的马来民族，有麋集在岌巴海港的海人，还有从中国来经商的过客。

皇家山上残存的遗址与出土遗物，也显示了古新加坡的若干史

迹。1822年2月，新加坡第二任驻劄官克劳福 (J. Crawford) 曾目睹皇家山的遗址，有城堡、庙宇的断墙颓壁、残破的壕沟、石刻的碑文与疑为国王伊斯干陀沙的陵墓等等，此外还有中国各类的陶瓷器碎片，以及中国10与11世纪的铜钱，这些铜钱是北宋真宗(998-1022年)与神宗(1068-1085年)时代的产物。⁴

据学者研究，中国的铜钱自唐宋以迄于清，是东南亚的通货，为东南亚等地人民广泛使用。因此西自东非，东至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以及居间的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都有中国钱币的发现。⁵然而，北宋铜钱为什么会流落在皇家山上？当时是不是作为一种货币使用？是不是中国商人带来的？是什么时候带来的？恐怕都很难有确切的答案，只能依凭臆测而已。

1984年初，在国家博物馆的策划下，米克锡博士(Dr. J.N. Miksic)在皇家山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收获良多。发现的遗物有许多陶器碎片与破旧器皿，其中以容器居多，有瓶、罐、瓮等，制作类型与颜色各异，有的是土产的，有的是从中国进口的。有趣的是一种名为“广东器皿”(Kwangtung Ware)的陶器，顾名思义，是从广东出口的货物。

出土遗物还包括大量的瓷器碎片。依其不同的颜色与制作，可类别为三种，即青瓷、白瓷与白中带蓝瓷，都是中国烧窑的制品，历经宋末、元与明初的年代，亦即13世纪与14世纪的产物。⁶米克锡甚至相信是制作不久后即运到新加坡来的。⁷

宋元时期(960-1368年)的400多年间，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由于利润丰厚，所以不仅有官营的海外贸易，民间商人也趋之若鹜，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活动。那时候，东南沿岸的主要商港有广州、泉州、明州与杭州等，中外商贾云集于此，政府因而设立了市舶司制度，制订了许多条文，来处理中外商舶进出口及货物征税事宜。

宋元时期，“南海诸国”（泛指从东南亚到非洲东岸及阿拉伯半岛等广大海域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其中尤以阿拉伯地区、爪哇与苏岛为甚。“南海诸国”的商人，每当吹送西南季候风之际，不惜忍受波涛汹涌之苦，乘船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香料（如丁香、豆蔻、沉香、檀香等）、奇珍异宝（如象牙、犀角、真珠、琉璃等）、布匹、皮货及其他杂物。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商人，利用东北季候风的吹送，南航抵达“南海诸国”，他们带来的主要货品有陶瓷器、纺织品、农产品和副食品以及金属制品等，与当地商人进行贸易。⁸

基于上述，宋元时代既有不少中国商贾南来经商，而这时期的新加坡又是个贸易商港，应该会引起华商的注意，从而到这儿来从事商业

活动。因此，皇家山的陶瓷器，很可能是由华商在那时运进来的，这与《岛夷志略》的载述是相吻合的。不过这样的臆测纵使是事实，这时期的华人也只不过是新加坡的过客吧了！

1391年，满者伯夷挥军侵略新加坡，使新加坡沦为废墟，但不久后它又恢复生机，发展为一商港。中国载籍如《郑和航海图》（成书于15世纪中叶）、《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东西洋考》（成书于1568年）、《西洋朝典录》（成书于1520年）、《顺风相送》（成书于16世纪）、《指南正法》（成书于18世纪初）等书，都有“龙牙门”的载述。上述各书中亦提及“长腰屿”一名，据学者考订，“长腰屿”是一个航运中心，亦即西方图籍中的Pulo Panjang，其地望可能是今天的圣淘沙。⁹

然而，马六甲王国的兴起，发展为一国际贸易商港，吸引了许多外商前往经商，相形之下，新加坡沦为次要地位。16世纪初，当葡萄牙籍商人Tomé Pires足履新加坡时载述道，新加坡海峡的人口不多，只有若干村落，其“王国”版图狭小。不过由于岛上盛产黑木，吸引了一些中国商人的到来。¹⁰

据1604年葡人图籍所示，在新加坡河口附近，设有一港务官(Shahbandar)的官署，港务官的职务主要是处理外商事务，征收商船的货物入口税务，成为地方上重要岁入源泉。港务官的设置，说明了17世纪初年新加坡依然维持了商港的地位。¹¹

由于新加坡位于东西航线的十字路口，为商船必经之地，所以自16世纪以来，西方的图籍上，都出现了Singapore的地名。¹² 1819年以前，中国载籍并未出现过“新加坡”的名称。继“单马锡”与“长腰屿”的名称之后，有“息辣”的称谓。¹³ “息辣”是马来语Selat的对音，义即“海峡”，嗣后又转为“石叻”、“息力”等，都是指新加坡。

18世纪之际，中国商船继续到新加坡来经商。厦门志卷一五风俗条载述道：“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1736-1795年）初年”。那时候，这些船舶“外至吕宋、苏禄、实力（新加坡）、葛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越南宋福玩、杨文珠的《暹罗国路程集录》书中载有“龙牙门”一名，说是有马来人官吏镇守。该书成于1810年，即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9年，这说明了那时的新加坡并非一废墟。¹⁴

1819年1月杪，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莱佛士率领一支船队，从槟榔屿浩浩荡荡南航抵达棋樟山(St. John Island)。在威迫利诱下，驻守新

加坡岛的天猛公(Temenggong)只得于1月30日与莱佛士签约,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占新加坡,成为发展东方贸易的一个前哨站。据莱佛士与当时的纽波德上尉(Captain Newbold)的记录,那时的新加坡只是个渔村,居民约有150人,其中有马来人及海人,他们多半是渔夫与海盗,亦有约30名华人。

上述人口的记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邱新民就引述了一系列的文献资料,说明那时的新加坡并非是荒岛,而是一个商港。莱佛士等人说的150名居民,只是限于新加坡河口附近的人数,他们忽略了散居在其他地方的加冷人(Orang Kallang)与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以及在内地从事种植业的华人。他估计那时的居民约有500人左右。¹⁵

“150人”之说,也多不为后来撰写历史的学者所接纳。皮尔逊(H.F. Pearson)就估计介于300与400之间;¹⁶ 鲁白野认为介于200至300人间;¹⁷ 《南洋年鉴》说是“不过五百人”;¹⁸ 而滕蒲(C.M. Turnbull)更进一步认为“1819年1月的新加坡,居民大约近千人,其中约有500加冷人,200实里达人,150基蓝人(Orang Gelam),他们散居于新加坡河一带,在岌巴港附近还有海人。此外天猛公的随从有二三十人,华人也有二三十人”。¹⁹

比较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莱佛士登陆前新加坡华人的境况。毫无疑问,那时候的新加坡已有华人从事甘蜜的种植。以下是三项重要的档案记录:

(A) “当着手清理政府山(Government Hill)朝北的实利己山(Bukit Selegie)时,在山的西侧已经有一个华人的甘蜜种植园”。

“在我们开拓新加坡以前,在政府山向西的旷地上,已有一个华人的甘蜜园”。

(Letters from W. Farquhar, Resident, to Lt. L.W. Hull, Secretary to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Raffles), dated 23, XII, 1822. Vol. L 11,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B) “在我们开始拓殖英殖民地之前,天猛公已拨地给马来人与华人,约有20个种植园丘已开发”。

(Letter from W. Farquhar, Resident, to Lt. L.W. Hull, dated 28, XII, 1822).

(C) 此外,还有以下土地注册官承认的买卖记录: 陈银夏(Tan Ngun Ha)承认于1822年5月10日将史坦福山(Mt. Stamford即今日珍珠山Pearl's Hill)西侧的甘蜜园卖给柏尔上尉(Captain J. Pearl),这些园丘都是在英国人来之前拓殖的。同日,陈亚路

(Tan Ah Loo) 也把史坦福山西南侧的甘蜜园售与同一人”。

“王端 (Heng Tooan) 于1822年5月13日将史坦福山东南侧的两个甘蜜园丘卖给柏尔上尉”。(Vol. L6,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²⁰

档案记录中 (C) 项的“Tan”姓，是“陈”姓的闽南方言拼音；而“Heng”姓却是“王”姓的潮州方言拼音。可见新加坡早期的华人拓殖先驱是闽南人与潮州人，他们很可能是从廖内群岛移殖过来的。

华人并不住在园丘内，他们卜居在离河口不远的新加坡河畔。天猛公委任了一名华人甲必丹管辖华人，甲必丹对天猛公负责。华人依然恋栈故土，热切盼望中国帆船的到来，和中国商人做买卖。中国商人搜购其甘蜜，却带来了米粮与布匹等生活用品。²¹

《重建顺天宫》勒石的碑刻，复引起1819年以前新加坡华人聚落的争议。事缘《南洋商报》记者黄义秋报道于1981年9月11日“发现”了《重建顺天宫》的石碑，²²顺天宫位于小坡马拉巴街 (Malabar Street)，是一座供奉大伯公的华人庙宇。顺天宫于光绪廿八年 (1902年) 重建竣工，曾勒石以志其盛，碑刻载述道：“（顺天）宫在新嘉坡麻班让路 (Rochor Road)，建自嘉道之际。”黄君以嘉庆元年是1796年；道光元年是1821年，因而推断顺天宫始建于1808年左右。²³邱新民赞同黄先生的估断，从而认为莱佛士来新加坡之前，“美芝路 (Beach Road)、梧槽路 (Rochor Road) 以至芋叶塘加冷盆地一带，也是华人的薮聚地”。这里“已有华人建筑的庙宇，表明这庙宇是许多人共同祀奉的地方，聚族聚群而居，崇拜大伯公”。可见“莱佛士计划市区，划为西方人士及阿刺伯人居住之前，这里已住有大量来自华南的华人了”。²⁴

顺天宫是不是建于1808年左右呢？历史学者萧启庆提出质疑，他认为庙宇是建于嘉庆 (1796-1820年) 与道光 (1821-1850年) 这两个年号之际，表明了建筑日期应介于1820年与1821年之间。他认为关键词在于“之际”，它指出那是1820年和1821年之间的分线。²⁵

嗣后，邱氏遍查词典，认为“际”可解为“介于其间”，亦可解为“适当其时”，因此难以确定年代，惟有“允执厥中”，坚持1808年的看法。

倘若庙宇是建于1808年，那么重建立碑时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是嘉庆13年？或许因为年代久远，重建与初建时相隔约近百年，勒石时不能断定确切的年代，所以碑文说“其时规模粗具，因陋就简，尚未有以记其事者也，故其详不可得闻”，除非有新证据的发现，否则推断只是臆测之词。更何况 Leon Camber 的 *Chinese Temples in Singapore* 《新

加坡华人庙宇》一书中说：“An altar to Toh Peh Kong was first set up in an attap shed near this site as early as 1821. It was then rebuilt and enlarged in the late 1840s and extensively redecorated in 1903.”（早在1821年，这里附近就盖了一间茅寮，里头有供奉大伯公的神坛，在19世纪40年代重修扩建，到1903年再做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因此在没有新证据发现之前，还是存疑为是。

总结来说，至少在14世纪中叶之际，华族商贾已经足履新加坡岛国了。他们可能是来自泉州的商人，利用东北季候风的吹送，乘着帆船，带来了瓷器与布匹等产品，与当地人民展开贸易。从15至18世纪间，中国商船仍陆陆续续停泊在新加坡商港，中国商贾在这里从事贸易活动。迨至1819年初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沿着新加坡河岸已有华人聚居。他们凭着克勤克俭的传统精神，胼手胝足，披荆斩棘，把实利己山与史坦福山等地的荒野，辟为甘蜜园丘，成了新加坡农业发展的先驱。

注释

1. 《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是南宋福建路市舶司。这是他在任期间，根据诸蕃图和贾胡的口述，译以华语而成的著述。关于“凌牙门”方位的考订，陈育崧与许云樵都认为是新加坡（见陈著《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一文，刊于《椰阴馆文存》，第1卷，新加坡，1984，页54-57；许著《马来亚史》，新加坡，1961，页274-275）。但也有些学者抱持异议，考订凌牙门即印尼的 Lingga Strait 或 Berhala Strait [见 Braddell, R., "Lung-Ya-Men and Tan-Ma-Hsi",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 Vol xxiii, Pt.1 (1950), PP.37-51; Gibson-Hill, C.A., "Singapore Old Strait and New Harbour (1300-1870)",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No.3 (1956), P.37, Note 58]。
2. 《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是江西南昌人。年轻时“尝两附舶东西洋”，在海外度过了8年的时光，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中东乃至非洲东岸等地。他将所见所闻，撰成《岛夷志略》一书，全书著录了99条。由于内容翔实，是为研究14世纪东南亚历史的珍贵史料。该书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都作了译注与考订。

3. 关于“龙牙门”的考订，见 Barnes, W.D., "Singapore Old Straits and New Harbour", *Journal of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60(1911), PP.25-34; Gibson-Hill, C.A., "Singapore Old Strait and New Harbour(1300-1870)", *Memoirs of the Raffles Museum*, No.3(1956), PP.29-45。“龙牙”二字，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释为“门之状如龙角”。费信《星槎胜览》也说：“两山相对，如龙牙状，故名。”西方学者 Wheatley P. 说是船头系石碇的垂直双木，中国舟子用来形容两块坚实而突出的巨石（见 "The Golden Khersoneses", P.82）但陈育崧却认为“龙牙”是马来语 Lingga 的音译，“门”是发船之处，出海要津，即所谓“口岸”，所以“龙牙门”一名是马华合璧的地名。（见《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页54-57）。
4. Crawford, J.,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London 1828). 重刊于 Miksic, J.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 Excavations at Fort Canning*, 1984, PP.140-141.
5. 邱新民，《新加坡寻根》，页132。
6. 有关皇家山出土遗物，可参阅 Miksic, J.N., 同前引书。
7. 同上引书，页76。
8. 有关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可参阅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
9. 见陈育崧《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页57-60；邱新民《长腰屿即新加坡的图证》，刊于《新加坡寻根》，页135-138。
10. Miksic, J.N., 同前引书，页33。
11. 同注10。
12. 陈育崧曾参阅这些图籍并制成一表，见《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页62。
13. 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1730)与谢清高《海录》(1820)。
14. 《暹罗国路程集录》(*Collected Records of Itineraries of Sia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6, 页56。
15. 见《莱佛士登陆时的新加坡》，刊于《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页235-248；《1819年来佛士登陆前新加坡已是一商港》，刊于《新加坡寻根》，页117-120。
16. Pearson, H.F., *Singapore: A Popular History*, P.3.
17. 鲁白野，《狮城散记》，页14。
18. 《南洋年鉴》第二编“新加坡”，第三章历史。
19. Turnbull, C.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P.5.
20. 转引自 Bartley, W.,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in 1819",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XI, Pt.2, Dec.1933, P.177.
21. Pearson, H.F., 同前引书，页2-3。
22. 其实在黄义秋“发现”碑刻之前，该碑刻早已被发现了，刊载于《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中（页152-155）。该书由陈育崧、陈荆和编著，大约于1970年出版。
23. 见《新加坡寻根》，页91。
24. 《顺天宫碑石的发现小语》，见《新加坡寻根》，页93-94。
25. 《新加坡寻根》，页99。

第二章：移民南来与人口增长 (1819—1941年)

概述

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在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励与策动下，华南移民便纷纷渡海而来。到了1836年，华人人口已超越马来人，高居全民之榜首。不过，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1840-1842年）以后，华南移民才大规模移入。到了19世纪末，全岛华人人口已突破10万大关。进入了20世纪首40年，除了短期间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经济萧条的影响外，华南移民蜂拥而来，掀起了一个个移民浪潮。

19世纪之际，南来的移民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移民多半是被拐骗来的娼妓，两性不平衡，男女失调，酿成了许多社会问题。20世纪以后，南来的女性渐多。到了30年代，政府施行移民限制法令，限定男性移民数额，而妇孺却可自由入境，这一来，两性便渐趋平衡。

南来的移民可类别为二：一类是契约劳工（猪仔）；另一类是自由移民。前者如猪仔一样，卖给雇主，作无补偿的劳役。19世纪60与70年代，是猪仔贸易的鼎盛时期，随后则逐渐收敛。而自由移民则在抵埠后，行动自由，不受限制。20世纪移民多属自由移民。

第一节：19世纪移民与人口激增

当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内地榛莽未辟，人迹罕至；沿海地带一